

# 竟陵“士林”考论

## ——读《金楼子·说蕃》

钟仕伦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集文学之事, 始见于萧子显《南齐书·武十七王·萧子良传》, 但萧子显不言人数及具体人名。梁元帝萧绎《金楼子·说蕃》篇在萧子显的基础上率先提出十一人的竟陵文士集团, 并以“士林”号之。《梁书·武帝纪》有竟陵“八友”之说; 《梁书·沈约传》言竟陵文士则仅列举六人。三种说法, 人数不同, 名号有异。如此差异恐与《梁书》编撰过程有关。《金楼子·说蕃》篇所列十一人的竟陵“士林”, 较之《梁书·武帝纪》的竟陵“八友”之说和《梁书·沈约传》的“六人”说, 似更能反映竟陵文士集团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 竟陵; 士林; 八友; 《金楼子》; 《梁书》编撰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09)04-0090-07

梁元帝萧绎《金楼子·说蕃》篇云:

竟陵萧子良开私仓赈贫民, 少有清尚, 礼才好士, 居不疑之地, 倾意宾客, 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善立胜事, 夏月客至, 为设瓜饮及甘果, 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 皆发教撰录。居鸡笼山西邸, 集学士抄《五经》、百家, 依《皇览》列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 讲论佛法, 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 江左未有也。好文学, 我高祖、王元长、谢玄晖、张思光、何宪、任昉、孔广、江淹、虞炎、何偁、周顒之俦, 皆当时之杰, 号士林也。<sup>[1]</sup>《说蕃》

此与《梁书·武帝纪》及《沈约传》的记载均不相同:

竟陵王子良开西邸, 招文学, 高祖与沈约、

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 号曰八友。<sup>[2]</sup>《武帝纪》

(约)迁太子家令, 后以本官兼著作郎, 迁中书郎, 本邑中正, 司徒右长史, 黄门侍郎。时竟陵王亦招士, 约与南陵萧琛、琅邪王融、陈郡谢朓、南乡范云、乐安任昉等皆游焉, 当世号为得人。<sup>[2]</sup>《沈约传》

萧绎《金楼子·说蕃》篇所载萧子良赈济贫民和开西邸集文学之事, 始见于萧子显《南齐书·武十七王·萧子良传》, 《金楼子·说蕃》篇所载似萧绎抄撰为之。然萧子显不言竟陵文士集团的具体人数及人名, 其中原因, 今已难明。此不论。竟陵文友的总数似不以《梁书·武帝纪》的“八友”、《沈约传》的六人、《金楼子·说蕃》篇的十一人为限, 尚有王僧孺<sup>①</sup>、宗夬<sup>②</sup>、王亮<sup>③</sup>、谢璟<sup>④</sup>、僧佑、江洪等人, 《梁书》和《金楼子》二书恐各以约数言之。

本文不再考论竟陵文士集团之全部, 旨在对《金

收稿日期: 2009-04-07

基金项目: 本文是作者承担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金楼子》校注”(课题批准号: 0549)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钟仕伦(1953—), 男, 四川成都人, 文学博士,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楼子》、《梁书》现有记载之差异进行分析,以期加深对竟陵文士集团和梁元帝文学批评思想的进一步了解。为论述方便,特将《梁书·沈约传》、《梁书·武帝纪》和《金楼子·说蕃》篇所载竟陵文士集团名单罗列如下:

《梁书·沈约传》:沈约、萧琛、王融、谢朓、范云、任昉

《梁书·武帝纪》:高祖(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

《金楼子·说蕃》篇:我高祖(萧衍)、王元长(王融)、谢玄晖(谢朓)、张思光(张融)、何宪、任昉、孔广、江淹、虞炎、何憺、周颙

《梁书·沈约传》与《武帝纪》相比在人数上少了两人,缺“萧衍”和“陆倕”。《梁书·沈约传》、《武帝纪》和《金楼子·说蕃》篇都提到“谢朓”、“王融”、“任昉”三人。《沈约传》、《武帝纪》均提到“沈约”、“范云”二人。《梁书·武帝纪》、《金楼子·说蕃》同时列“高祖”、“我高祖”萧衍。《沈约传》不列“萧衍”。《金楼子·说蕃》篇不列“沈约”、“范云”,且独增“张思光(融)”、“何宪”、“孔广”、“江淹”、“虞炎”、“何憺”、“周颙”,此又有别于《梁书·沈约传》和《武帝纪》。《梁书·武帝纪》、《金楼子·说蕃》同时列“高祖”、“我高祖”萧衍,此语显然是萧衍驾崩之后所谓。

## 二

一般来说,同一本记载同一个朝代的正史著作中对同一个文士集团的记载,人数及人名似应相同。造成竟陵文士集团记载在《梁书》本身的差异及《梁书》与《金楼子》的不同,我以为这其中的原因恐与《梁书》的编撰有关。

《梁书》的编撰较为复杂。梁武帝时,武帝纳徐勉荐,以裴子野“为著作郎,掌国史及起居注”<sup>[2]</sup>《裴子野传》,天监(502—519)中,沈约已成《高祖纪》十四卷<sup>[2]</sup>《沈约传》。元帝时,其领国史撰修者恐为萧韶、谢吴<sup>⑤</sup>,北周的滕王逖、甚至萧绎本人亦撰写过梁代之国史<sup>[4]</sup>《萧大圜传》。又据顾亭林《日知录》卷二十六《梁书》章:

《刘孝绰传》:“众恶之,必监焉;众好之,必监焉。”梁宣帝讳“誉”,故改之。盖襄阳以来,国史之原文也,乃其论则直书“姚察”。<sup>[4]</sup>

可知,梁敬帝时亦有所谓的国史修撰。

然上述各人编写的梁史,包括何之元的《梁典》均未传世。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梁书》悉据国史立传”章云:“《梁书》本姚察所撰,而其子思廉续成之。(说见前。)今细阅全书,知察又本之梁之国史也。各列传必先叙其历官,而后载其事实,末又载饰终之诏,此国史体例也。”<sup>[5]</sup>姚察自己开撰《梁书》的时候大概在陈太建(569)之后,地点在建康,此时距江陵亡陷已有十四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梁书》条云:“唐贞观三年,诏思廉同魏徵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采谢吴等所记以成此书。徵惟著总论而已。”<sup>[6]</sup>换句话说,《梁书》的编撰,经百余年而历梁、陈、西魏、北周、隋、唐六个朝代。《金楼子》与《武帝纪》所载竟陵文士集团相异,恐与此《梁书》成书的特殊过程有关。《武帝纪》与《金楼子·说蕃》同时列“高祖”、“我高祖”,显然是萧衍驾崩之后语,其文似非国史原文。反过来说,《沈约传》言竟陵文士集团不及“高祖”萧衍,恐为国史原文,为萧衍驾崩前所载,史官自当为高祖践祚之前游宴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有所讳。

《梁书》与《金楼子》关于竟陵文士集团的记载的矛盾恐亦与《金楼子》的成书时间有关。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谓《金楼子》成于梁元帝作湘东王时<sup>[7]</sup>卷十,王鸣盛疑其成于即位后语<sup>[8]</sup>卷五十九,“阮太后与《金楼子》互异”,余嘉锡先生谓其成于侯景之乱前<sup>[9]</sup>98—99。但《金楼子》全书恐非一时一地所能成,各篇的成书时间亦不尽相同。《说蕃》篇似成于太清三年(549)之后。《金楼子》成篇最晚的时间是《聚书》篇的承圣三年(554),全书的绝笔大概也在这个时候<sup>[10]</sup>4—11。十四年后,姚察始撰《梁书》,“国史所有则传之,所无则缺之也”<sup>[5]</sup>“《梁书》悉据国史立传”。《沈约传》与《武帝纪》所载竟陵文友的差异恐源于此。

今《陈书·周弘正传》载有一段《金楼子》文:“元帝尝著《金楼子》,曰:‘余于诸僧重招提琰法师,隐士重华陶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于义理,清转无穷,亦一时之名士也。’”<sup>[11]</sup>据此,姚察父子似见过《金楼子》。《陈书》已引《金楼子》,姚思廉父子撰写《梁书》似也应有所引用。但今《梁书》关于竟陵文士集团却明显未参考《金楼子·说蕃》篇文。其中的原因,今天已经很难弄清楚,只有留待今后备考。

《梁书·范云传》、《任昉传》、《萧琛传》,包括《金

楼子·说蕃》篇提及竟陵文士西邸之游时,均未言及陆倕<sup>[12]</sup>。《梁书·武帝纪》提及“陆倕”,是姚思廉在撰写《梁书》时“推其父意”所增加抑或是武帝之后的国史旧文原本如此,今已不得而知。但《梁书·武帝纪》将竟陵文士西邸之游命为竟陵“八友”的作法与起源于东汉末年的人物揆擢品题之风有关。

桓帝之世,党锢之祸起。“自是正直废放,邪妄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揆擢,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俊者,言人之英也。……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及者,言能道人追宗者也。……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sup>[13]</sup>《党锢传》魏晋之后,“曹魏八达”、“北齐八贵”、“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名号亦时有出现。然此以“八”、“七”为号者有个特点,即均为足数,《梁书·武帝纪》标竟陵“八友”也不例外。

现在的问题是,《金楼子·说蕃》篇所列举的十一人的竟陵“士林”是否符合竟陵王开西邸集文学之士的历史实际?

### 三

我们先来看在《金楼子·说蕃》篇中于《梁书·武帝纪》、《沈约传》所不载的何宪、孔广、张融、江淹、虞炎、何憺、周顒等人与萧子良的关系。

何宪,字子思,生卒年不详。庐江灊(安徽霍山县)人,与齐太傅王俭、任昉相友善,“时人呼孔暹、何宪为王俭三公”<sup>[14]</sup>《虞玩之传》附《孔暹传》。何宪以强学见知,《南史·何宪传》称其:“博涉该通,群籍毕览,天阁宝秘,人间散逸,无遗漏焉。任昉、刘泐共执秘阁四部书,试问其所知,自甲至丁,书说一事,并叙述作之体,连日累夜,莫见所遗。”<sup>[15]</sup>何宪尝作国子博士。永明十年(492)使于魏。

何宪为竟陵文友,与萧子良的交往,他书未见,今仅见于《金楼子·说蕃》。从任昉向何宪求教有关秘阁四部书籍的编撰和萧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列为《四部要略》千卷”来看,何宪在竟陵文士集团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孔广,字淹源,生卒年不详。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与王俭、丘巨源、张绪等同时。《南齐书·孔广

传》言其“美姿制”。《南史·孔广传》称其“美容止,善谈吐”,“王俭、张绪咸美之。俭常云:‘广来使人废簿领,匠不须来,来则莫听去。’绪数巾车诣之,每叹云:‘孔广使吾成轻薄祭酒。’仕至扬州中从事。”又据《南齐书》“永明五年,山阴县孔广家园怪树十二层。会稽太守隋王子隆献之,种芳林园风光殿西”<sup>[14]</sup>《祥瑞志》的记载可知,孔广亦为永明时期的文士。

张融(443—497),字思光,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弱冠即有异名,获时贤推誉。形貌短丑而精神清澈,风止诡越而神解过人。好《孝经》、《老子》、《法华经》。文体英绝,《海赋》传世。少时为诗即有“高尚之言”<sup>[2]</sup>《何点传》。为文主张师心使气,文体奇变<sup>⑥</sup>。从张融今存诗歌来看,既有玄义深奥的《白日歌》诗;也有明白如话,景在目前的《忧且吟》和《别诗》。其诗风如人,朗然清澈,流转上口。

张融与萧子良相交甚早。武帝即位,封子良为竟陵王,永明元年(483)徙为侍中、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永明二年(484)入为护军将军兼司徒,开西邸。张融于永明二年前即为“竟陵王征北谘议,并领记室,司徒从事中郎”。《南齐书·张融传》载,竟陵人张欣时为诸暨令,坐罪当死。张欣时的父亲张兴世曾于宋世征讨南谯王刘义宣。官军欲杀张融的父亲张畅,张兴世“以袍覆畅而坐之”,张畅以此得免。张兴世卒后,张融曾“著高履负土成坟。至是融启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时死。子良答曰:‘此乃是长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长史所怀。’”张融于永明八年(490)迁司徒右长史。能违常典启稟子良以报救父之恩,从中不难看出二人相交甚深的情谊,以致萧子良薨,张融“自以身经佐史,哭辄尽恸”<sup>[14]</sup>《张融传》。张融对儒、释、道均感兴趣,又好文学,其《海赋》远胜木华,时有“实超玄虚”<sup>⑦</sup>之美誉。此其一。

其二,张融为吴地人,善“洛生咏”,并因此而幸免一死。陈寅恪先生曾据张融等能作“洛生咏”,考辨出“除民间谣谚之未经文人删改润色者以外,凡东晋南朝之士大夫以及寒人之能作韵者,依其籍贯,纵属吴人,而所作之韵语则通常不用吴音,盖东晋南朝吴人之属于士族阶级语者,其在朝廷论议社会交际之时尚且不操吴语,岂得于其摹拟古昔典雅丽则之韵语转用土音乎”<sup>[16]</sup>《东晋南朝之吴语》,271的结论,这说明张融虽为吴人,但对“四声”当有所涉猎。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张融有可能在善造“经叹

新声”的竟陵文士集团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江淹(444—505)与沈约、任昉、王融同时。宋、齐易代之际,江淹颇有辅佐之功。后虽有才尽之讥,然章表书奏、赞颂诗赋,均称颂一时。萧子良于永明二年(484)人为护军将军兼司徒,开西邸。江淹于“永明初,迁骁骑将军,掌国史。出为建武将军、庐陵内史。视事三年,还为骁骑将军,兼尚书左丞,寻复以本官领国子博士”<sup>[2]</sup>《江淹传》。《南齐书·庾杲之传》亦云“永明中,诸王年少,不得妄与人接,敕杲之与济阳江淹五日一诣诸王,使申游好”,江淹与萧子良西邸之游,虽史无明载,但据以上事实可知,江淹与萧子良在永明中似应有交往,故萧绎言其为竟陵文友恐出之有据。

有关虞炎的史料甚少,《南齐书·文学传》将其附于《陆厥传》后,云:“会稽虞炎,永明中以文学与沈约俱为文惠太子所遇,意眇殊常。官至骁骑将军。”《南史》同。虞炎的生卒年不详,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卷四《梁陈》“虞炎事迹”条据沈约《怀旧诗》考订虞炎的卒年为永元元年前后,即公元499年左右<sup>[17]</sup>。

虞炎有《奉和竟陵王经刘瓛墓下》、《饯谢文学离夜》诗。同时饯别谢朓随隋王萧子隆赴荆州任上的还有沈约、范云、王融等,均为竟陵王西邸文友。

虞炎于时声名颇高,曾为《鲍照集》作序,其序称鲍照“虽乏精典,而有超丽”,可谓独具只眼,得到后人首肯<sup>[18]</sup>卷四十六,“鲍明远咏史诗”。虞炎诗歌,虽有钟嵘讥其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sup>[19]</sup>358之评,但杜甫却转益师之。《能改斋漫录》卷七《事实》“黄鸟”条云:“杜诗:‘转枝黄鸟近,泛渚白鸥轻。’盖用齐虞炎《玉阶怨》云:‘紫藤拂花树,黄鸟度青枝。’”<sup>[20]</sup>《后山诗话》云:“余登多景楼,南望丹徒,有大白鸟飞近青林,而得句云:‘白鸟过林分外明。’谢朓亦云:‘黄鸟度青枝。’语巧而弱。”<sup>[21]</sup>其又误虞炎诗为谢朓诗。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云:“至于谢玄晖,始见贫小,然而天才命世,过足以补尤。”萧绎用“贫小”<sup>⑧</sup>评谢诗,陈师道用“巧弱”评“黄鸟”句,正说明虞炎与谢朓二人诗格相似,其诗几可易主。

何偁,生卒年不详。《南史·何逊传》附《何偁传》云:“逊从叔偁字彦夷,亦以才著闻,宦游不达,作《拍张赋》以喻意。末云:‘东方曼倩发愤于侏儒,遂与火头食子禀赐不殊。’位至台郎。”郑樵《通志二十略·艺文略第七》云:“义兴郡丞《何偁集》三

卷。”<sup>[22]</sup>1755据《册府元龟》卷七百十三《宫臣部·规讽》第二载,何偁曾为文惠太子作《杨畔歌》,“辞甚恻丽,太子甚悦。(袁)廓之谏之曰:‘夫《杨畔》既非典雅,而声甚哀思。殿下当降意《箫韶》,奈何听亡国之音?’太子改容谢之”<sup>[23]</sup>。又《魏书·岛夷刘裕传》云,宋顺帝刘准于公元477年改元为升明,“准遣员外散骑常侍何偁、员外散骑侍郎孔遏朝贡”<sup>[24]</sup>。

文惠太子立于永明元年(483),卒于永明十一年(493),何偁与竟陵王子良交游,史无明载。萧绎言其为竟陵文友,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何偁为文惠太子友,所作甚为太子赏悦,而文惠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sup>[14]</sup>《文惠太子传》,交游密切。二人又并礼接文士,所好相同,故何偁有接触竟陵王子良、继而参与西邸之游的可能。二是何偁为文,“声甚哀思”、“辞甚恻丽”,这与萧绎倡导的“文者,维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和“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sup>[1]</sup>《立言》的文学观念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周颙,约生于宋元嘉十八年(441),卒年史无明载。据刘跃进先生考订,周颙卒年应为永明八年以后、永明十年以前<sup>[25]</sup>367。周颙对汉语和梵语音律音韵颇有研究。《南齐书·周颙传》说他不仅“音辞辩丽,出言不穷,宫商朱紫,发口成句”,而且“泛涉百家,长于佛理。著《三宗论》”,实为竟陵王子良造“经呗新声”的主力。

四声的创立,据陈寅恪先生考订,实与当日佛经转读有关。佛经转读经典与中国固有平上去三声分为三阶相同无疑。“平上去则其声响高低相互距离之间虽有分别,但应分别之为若干数之声,殊不易定。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此四声之说所由成立,及其所以适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声之故也。”<sup>[26]</sup>《四声三问》,368僧祐《略成实论记》记载,永明七年十月,萧子良集京师硕学名僧五百余人讲经,请成实论高僧定林寺僧柔、谢寺慧次于普弘寺讲论成实义理。“令柔、次等诸论师抄比《成实》。简繁存要,略为九卷。(中略)即写略论百部流通,教使周颙作论序”<sup>[27]</sup>405。而声谱之作,周颙为始作俑者,其《四声切韵》,颇行于世。竟陵王萧子良请周颙作成实《略论》序,沈约四声之说起自周颙<sup>[28]</sup>214,足见周颙研究

内典之功力与创立声律说之地位在齐梁文士中已得到公认,萧绎将其列为竟陵士林,誉为当时之杰,名至而实归。

## 四

萧绎《金楼子·说蕃》篇以“士林”号竟陵文友,此与《梁书·武帝纪》、《沈约传》名号不同;多出三人,又与《梁书·武帝纪》、《沈约传》人数不同。沈约为“永明体”创始人,有齐梁文坛巨擘之称。《诗品》说:“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话虽对沈约有点不公,但竟陵文友中沈约的才能和贡献应该是最高的。“蜂腰鹤膝”之说奠定其在永明至天监时期文坛领袖的基础。萧绎《金楼子·说蕃》篇言竟陵文友却不入沈约,与《梁书》相异。其原因今已难明,试作如下推想。

一是可能受萧子显之影响。梁中大通二年(530),萧绎二十二岁时,萧子显的《齐书》已经撰写<sup>⑨</sup>。《南齐书·刘绘传》云:“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议,皆湊竟陵王西邸。绘为后进领袖,机悟多能,时张融、周顒并有言工,融言旨缓韵,辞致绮捷,绘之言吐,又顿挫有风气。时人谓之语曰:‘刘绘贴宅,别开一门。’言在二家之中也。”依萧子显的话,张融、周顒、刘绘在竟陵文友中的地位比较高,他也未言沈约在竟陵王西邸文士中的地位。

其二,可能与萧绎独特的文学批评思想有关。沈约为梁代今文体的领袖,而萧绎为文则主张调和今古。萧绎既与好古爱奇的裴子野、萧子云、张瓚等人为“布衣之交”<sup>⑩</sup>,又与萧纲、徐陵、庾肩吾新体诗人有所唱和,不独主张“二陆三张,岂独擅美”<sup>[29]《与萧摛书》,3047</sup>,且标榜“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所谓菁华,无以间也”<sup>[29]《内典碑铭集林序》,3053</sup>的品评标准。同时,萧绎与萧衍一样,不喜四声,作诗不遵用于严格的声律说。如用沈约的“蜂腰鹤膝”来对照,萧绎的一些诗,如《赋得涉江采芙蓉》诗就犯了“蜂腰”之病(首句“江风当夏清”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声)。他主张诗歌应如民间风谣一类的“唇吻遒会”,即诗歌音韵的自然流利,而非“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

三是沈约在梁元帝眼中,其对永明体或声律说的贡献恐不如王元长或周顒。《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云:“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顒。”近体诗声律说的创立,周顒、王融无疑为首倡者。钟嵘《诗品序》说:“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惟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其实大谬。惟兄范晔、谢庄乃识之耳。常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辨,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驾,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钟嵘推王融为创声律说之首的看法与萧绎《金楼子·说蕃》篇的看法相一致。

《金楼子·说蕃》篇所载竟陵“士林”兼有政治集团和文士集团的双重性质。子良虽“居不疑之地”,但与文惠太子同处政治争斗之中心,二人“同好释氏,甚相友悌”,然终因太子事发而被世祖“颇加嫌责”<sup>[14]《武十七王传·竟陵文宣王子良传》</sup>;江淹、何憺、周顒先后与文惠太子相交甚密;王融因力图“矫诏立子良”而被杀;谢朓与随王“年少相动”而被猜忌。

竟陵“士林”虽是一不成功的政治集团,但却是一个文学上取得重大成就的文士集团。也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政治上的不成功才成就了他们在文学上的重大贡献。“抄撰《五经》、百家”,勒为四部,在促进类书编撰和重振两汉学术传统的同时开启诗歌用典的新时期。“造经呗新声”,将外来佛教经典的翻译和梵音研究与中土诗歌固有音韵现象相结合,一是促进“声律说”的创立,为律诗的兴盛导夫先路;二是促进“文笔”之分的探究,为文学的进一步独立启其先鞭。而用典引起的“意义的排偶”和用韵引起的“声音的对仗”则成为律诗的两个最重要的条件<sup>[30]218</sup>,铸就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标准。而《金楼子·说蕃》篇所载的十一名文士则足以代表竟陵文士集团的创作风格和文学思想。特别是周顒、江淹、张融、何宪、虞炎、何憺的列入,弥补了《梁书·武帝纪》和《梁书·沈约传》的不足。

《金楼子·说蕃》篇所载的竟陵文友,从时间上说,比《梁书》早了将近一百年,距竟陵王开西邸约七十年,在文本的历史性上较之《梁书》自然可靠一些。其内容虽来自萧子显的《南齐书》,但所列“士林”之人,当比《梁书·武帝纪》、《沈约传》更接近竟陵文士集团的真实情况。较之《梁书·武帝纪》的“竟陵八友”之说和《梁书·沈约传》的“六人”说,十一人的

“竟陵士林”不独更为接近竟陵文士集团的本来面目,扩大了我们对竟陵文士集团创作风格和文学思想的了解,而且从另一方面加深了我们对梁元帝萧绎的文学思想的了解。

### 注释:

- ①《梁书·王僧孺传》云:“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延文学,太学博士王僧孺亦游焉。”
- ②《梁书·宗夬传》云:“竟陵王子良集学士于西邸,并见图画,南阳宗夬亦预焉。”
- ③《梁书·王亮传》云:“竟陵王子良开西邸,延才俊为士林馆,使工图画其像,秘书丞王亮亦预焉。”
- ④《梁书·谢徵传》云:“竟陵王开西邸,招文学,谢璟亦预焉。”
- ⑤见《南史·萧韶传》。又,《隋书·经籍志》:“《梁书》四十九卷,梁中书郎谢吴撰。”
- ⑥《南齐书·张融传》云:“融玄义无师法,而神解过人,白黑谈论,鲜能抗拒。永明中,遇疾,为《门律自序》曰:‘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汝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也。’”又临卒,戒子曰:“吾文体英绝,变而屡奇。”
- ⑦《南齐书·张融传》云:“(融)浮海至交州,于海中作《海赋》曰(中略)。融文辞诡激,独与众异。后还京师,以视镇军将军顾凯之,凯之曰:‘卿此赋实超玄虚,但恨不道盐耳。’融即求笔注之曰:‘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此四句,后所足也。”
- ⑧按:萧绎以“贫小”论谢朓,检齐梁间人及后人的谢朓品语均未言及,此“贫小”的含义谓何,初不易解,后读王利器先生《颜氏家训集解》引《资治通鉴》卷九十七胡注“寒者,衰冷无气焰也”解《颜氏家训·文章》“何逊诗实为轻巧,多形似之言,扬都论者,恨其每病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之雍容也”得知,“贫小”亦似“贫寒”,意谓作品气势稍弱,规制较小。故陈师道之“巧弱”、萧绎之“贫小”,语殊而意同。
- ⑨《梁书·萧子显传》云:“(子显)启撰齐史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中略)中大通二年,迁长兼侍中。”
- ⑩《金楼子序》云:“裴几原、刘嗣芳、萧光侯、张简宪,余之知己也。”

### 参考文献:

- [1]萧绎.金楼子[G]//知不足斋丛书:第九集.辛丑七月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
- [2]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3]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 [4]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5]赵翼.廿二史劄记[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7.
- [6]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M].光绪六年六月会稽章氏用芸书舍本重槧.
- [7]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8]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7.
- [9]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成都:巴蜀书社,1991.
- [10]钟仕伦.金楼子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1]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 [12]谭洁,闫玮.竟陵“八友”名号考辨[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 [1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4]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 [15]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6]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17]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18]何焯.义门读书记(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9]钟嵘.诗品[M]//曹旭.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20]吴曾.能改斋漫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21]陈师道.后山诗话[G]//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 [22]郑樵.通志二十略[M].王树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
- [23]王钦若.册府元龟[G]//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24]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5]刘跃进. 周颙卒年新探[C]//刘跃进. 门阀世族与永明文学. 北京:三联书店,1996.
- [26]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初编[M]//陈寅恪集.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27]僧祐. 出三藏记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95.
- [28](日)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 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29]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G]. 北京:中华书局,1958.
- [30]朱光潜. 诗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 Examination and Discussion of Jingling “Shilin”

ZHONG Shi-lun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three accounts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 the number of scholars and their designations of Jingling King of Qi Kingdom Xiao Ziliang's establishing Xidi and engaging in literature, which is perhaps connected with the process of *Liang Shu* compilation. Of the three, the account of Jingling “Shilin” (scholar group) of eleven-scholars in *Shuo Fan* of *Jin Lou Zi* is closer to the truth of Jingling scholar group than the “eight-friend” account in *Wu Di Ji* of *Liang Shu* and the “six-person” account in *Shen Yue Zhuan* of *Liang Shu*.

**Key words:** Jingling; Shilin; eight friends; *Jin Lou Zi*; *Liang Shu* compilation

[责任编辑:唐 普]